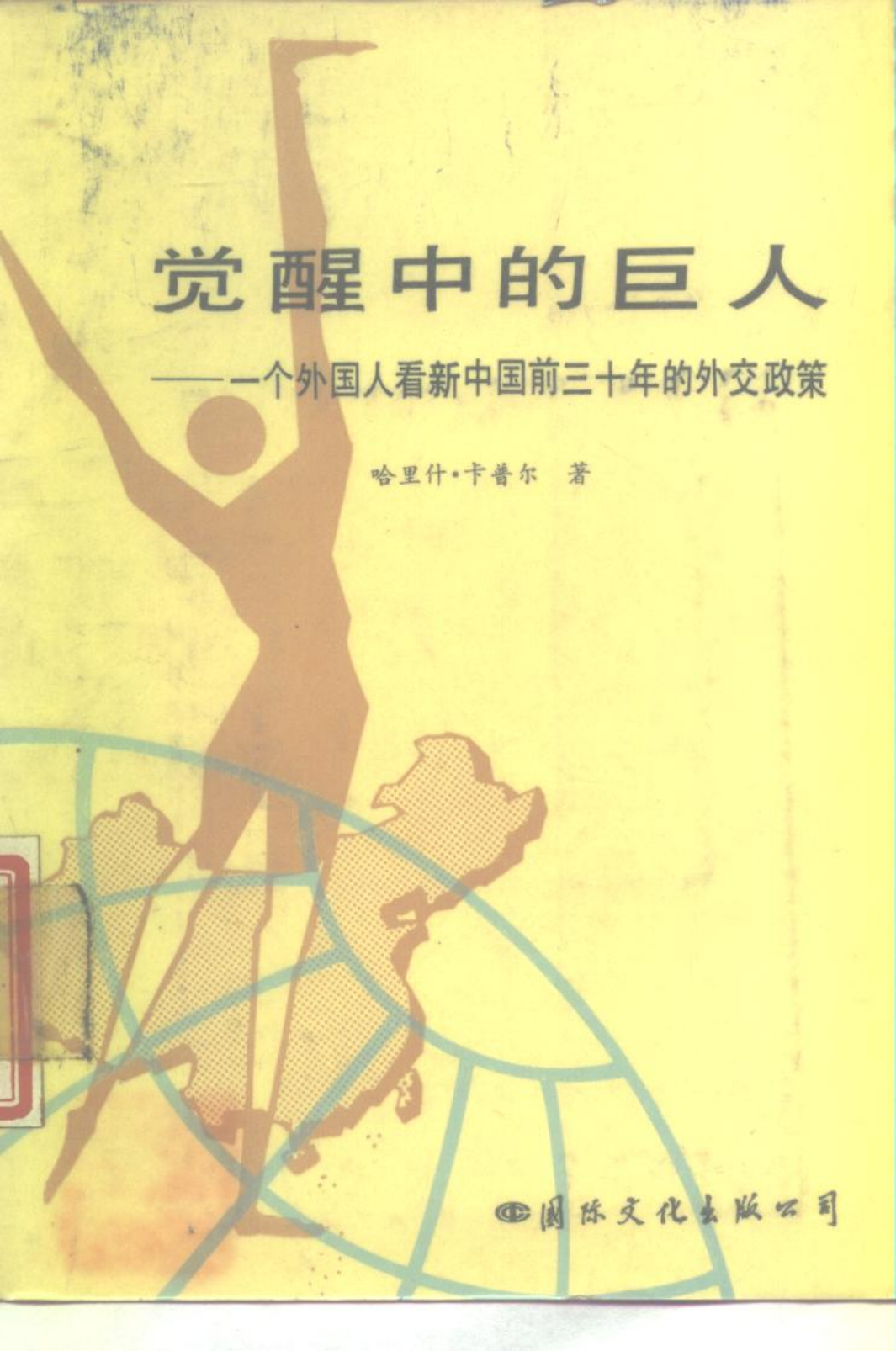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n brown and green tones. A large, simplified human figure with arms raised in a 'V' shape stands over a map of China. The map is rendered in a green, grid-like pattern.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yellow.

觉醒中的巨人

——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

哈里什·卡普尔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觉醒中的巨人

——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

哈里什·卡普尔 著

彭致斌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4173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7年·北京



1141734

THE AWAKENING GIANT
——China's Ascension in World Politics
By Harish Kapur

根据荷兰 Sijthoff & Noordhoff 公司 1981 年
英文版译出

觉醒中的巨人

——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

哈里什·卡普尔 著

彭致斌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20 千字

1987 年 9 月北京第一版 1987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345·001 定价: 2.40 元

ISBN 7-80049-016-5/D·1

出版说明

《觉醒中的巨人》一书，系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亚洲中心主任，伦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哈里什·卡普尔博士著，曾在荷兰和美国两地出版发行。

卡普尔先生曾四度访华，进行学术交流活动。1975年后集中研究中国问题，有《中国与亚洲世界》、《中国与第三世界》等多种有关中国的著作。

本书主要通过中国对外活动和政策论述新中国前三十年在国际政治中的崛起，从“一个软弱的，毫无发言权”的国家一跃而跨入大国行列的过程。作者认为：“拥护中国的人过分夸大中国的力量，敌视中国的人则过于贬低中国的力量。”

本书分别论述了中苏、中美、中日、中国和欧洲、中国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前有总论，后有预测，材料翔实，按历史顺序作双边叙述，系统性较强。这样一本全面论述新中国前三十年外交形势和政策的书在国内外均不多见，对我国从事国际政治研究、外交、涉外工作和希望了解国际形势的同志均具可读性和较大参考价值。

由于本书材料基本上截止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对我过去外交活动中“左”的东西有较多揭露。而且作者毕竟是外国人，其选材角度，持论立场，不可能与我们完全一致，这些我们似不应苛求，而可引为借镜，相信我国今天的读者是会正确取舍的。

中文版序言

自从本书在1981年问世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确实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虽然在此之前有些变化已经明显可见(本文将予以讨论)，但1981年之后出现的新事物却更多更突出。人们不禁会想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经历了一场真正的质变？

一、行事方式上的变化

从八十年代初起，人们更多地强调变化而不是继承，更多地强调这个国家应当采取的新指导方针，而不强调前些年所已制订的某些一成不变的原则。

首先，中国外交风格的转变是最为显著的。过去在中国官方文件、报刊评论等方面习用的过于革命的、给人以好战形象的词汇，已经被温和的、务实的、不事张扬的语言所代替；而在早期中国外交行事方式中通常居主导地位的威吓性和教训性的调子也不复存在，取代它们的是谦虚、谨慎和思想开放。

第二个主要变化表现在决策过程方面。中国外交领域的决策过程过去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积极参与决策过程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题的重要性。如果主题属于通常视为“高级”政策的范畴，例如涉及国家安全、联盟、国际危机、外交关系等，那么这些决策是由政府和党的最高层作出的，

当然，有关各部的一些专家可以列席。而主题属于“低级”政策和日常事务的范畴，则通常由各部的部长、官员以半自治的方式处理。尽管中国在外交领域决策过程中的问题分类粗略是这样办的，但是在革命成功后中国历史的动乱期间，“高级”政策和“低级”政策常常被混淆，其原因是，官员们以至部长们害怕以后受到批判或报复，在他们主管业务的范围内也不敢独立采取行动。

从八十年代初期起，在这个领域里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高级”和“低级”政策重新区分开来，以致于越来越多的“低级”决策现在由部级或司局级作出，他们再也不害怕撤换和受批判了。第二，决策的政治领导者们和行政官员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增加了。外交政策领域“高级”政策和“低级”政策之间截然区分的状况也越来越不那么明显了。行政官员们对重大问题逐渐增加了发言权。中国如按此道路继续发展，则行政官员们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在将来肯定还要加大。第三，决策过程比以前更为制度化。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重要之点是，在中央建立了“外事小组”^①，

“所有与外事有关的组织”均参加。尽管这个小组不作决策，但该小组的总结性意见或建议是受到重视的。最近建立的国务院国际研究中心是又一个重要的组织，它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正积极地对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见。该中心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的政策计划部门相当，其重要性从该中心由有长期外交经验的权威人士当领导可以看出。

^① 据Doak A. Barnett, 《在中国由谁制订外交政策》，见《中国贸易评论》1984年第5期，第56页。

第三个重要的变化是学术界更多地参与外事政策讨论。由于学术界一直对外交进行评论，所以这并不是什么新发展，新的发展是干预的深度和性质。1981年以前，学术界只是追随外交领域的最后决策作出具体解释，而决策本身则是由党和国家的高层作出。学术界的作用非常有限，他们的任务只是对已经作出的决策论证其正确性。显然这个情况已经在改变中。学术界的活动余地已经大得多，中国当局已经正式承认他们有发表不同观点的权利。可以看看最近关于欧洲的辩论。在中国新近关于鼓励“不同学派间进行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的指导方针下，对于欧洲在国际体系中的未来和中国对欧洲应当制订什么政策的问题上，人们已经公开说出了不同的观点。有些人似乎认为欧洲已无可挽回地与两个超级大国联系在一起，难于有真正自主的前景；另一些人似乎看到欧洲趋向于更大的自主，中国应通过自己活跃的政策鼓励这种趋向。中国这种新发展的令人感兴趣的特色在于辩论是公开的，而且在颇具盛名的新闻报刊上登载。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它对中国决策过程的影响将是意味深长的^①。

二、实质性的变化

从1949年的革命以来，中国有着四个主要的国内外目标，它必须为此四个目标制订对外政策。这就是国家安全，现代化，把周边地区与大陆统一起来和按照自己的形象建设世界。虽然目标始终如一，但八十年代初期起，在目标的涵义方面，在达到目标而制订的战略方面，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① 见《世界事务》中文版1986年第16期 Ran Longbo的有关文章。

中国要求安全，这在今天和过去毫无二致。但是为取得安全而制订的战略和1949年革命后的三十年却不尽相同。原先认为国家安全是只能通过自力更生加上某个大国的保护才能获得有效的保障。与此相反，现在的领导却想用另外的办法，即通过执行一条与有可能对别国施加威胁的那些国家起协调和解作用的全球性外交政策来保障国家安全。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和执行一条“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是比陷在昂贵的螺旋式的军备竞赛中更为有效的保卫安全的途径。

第二个目标，即现代化，无疑是个国内的目标。但是它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可以是很大的。这取决于这个国家采取的发展模式。如果采取自力更生的发展模式，则现代化对外交政策的冲击会微乎其微；但若发展模式是较为开放的并和国际经济体系有较多的相互作用，那就会对外交政策有相当大的冲击。从1980年起，中国的领导已把中国的经济从前一种模式改为后一种模式。新的“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政策与过去的“社会主义自力更生的发展”概念有着基本的不同。中国经济产生的变化可以从与外界日益增长的贸易来衡量，可以从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的数量来衡量，也可以从中国为了与资本主义世界作贸易而通过的广泛立法安排来衡量。

我们承认中国有许多工作还需要去做，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过去六年这个短暂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考虑到在以前差不多三十年里，中国人的思想和政策恰好与现在相反，则成就更为显著。

人们会问，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可逆转地和世界经济

联结在一起了，是否在国际经济波动中不再能保护自己免受影响？是否也会象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遭到厄运？中国国家大，经济上也是个巨人，实行的是基本上有控制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会使中国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化国际上的冲击，但也不能否认，中国要比从前更多地暴露在外部的波动之中。

中国要把待统一的几个地区统一起来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第三个主要目标。八十年代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先回顾一下革命成功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对这个问题是持断然态度的。中国声称这些地区（西藏、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在它认为合适的时候就统一起来，并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1951年统一西藏就是这种政策的实例。1976年以后，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政策有了根本的变化。重点不再放在暴力和单方面的统一上，而是放在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和平统一上。其中一个重要的条款是，有关地区可以保持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可以实行行政上的自治。经过二十五轮艰苦谈判而于1983年与英国达成的关于香港的协议，包含了中国新政策的所有重要内容。中国与葡萄牙当局进行的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和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都是中国新政策的体现。

许多国际观察家常常认为，这些地区的居民不赞成统一，不认为中国关于维持现状的声明是可信的。这也许是对的，因为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地区的居民有很大部分是从大陆逃出来的，他们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较为动乱的早期逃出来的。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这就是中国领导冒很大风险进

行“一国两制”的新试验。由于香港的经济模式是成功的，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确实高，社会主义经济会不会处于不利地位？会不会有人说，中国领导为了把完全由市场经济统治的地区统一进来，却损害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

中国的第四个外交政策目标是革命性。在中国革命后的三十年中，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向莫斯科的霸权挑战，大肆批判许多共产党的“修正主义”，坚持维护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从八十年代早期起，它们都不再被提及了。中国共产党最近提出的关于党与党的关系的新原则，与中国政府为国与国的关系所制订的原则十分相似，其中最重要的是双边主义和相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在六年的时间里中国确实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它的外交关系变化尤其大，重点放在变化而不是继承上。中国关注的问题是对它的外交行事方式赋予新的指导和新的风格，而不是重新确定基本目标。基本目标本质上是沒有变的。由于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变化的进程在将来还可能继续下去。但是在某些方面，现领导将会把旧的与新的、永久的与暂时的融合在一起，从而在继承与变化上再建新的平衡。

哈里什·卡普尔

1986年12月于日内瓦

(夏世璋译)

前 言

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是迅速的、史无前例的。所谓“迅速”，意指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已在国际体系中心战略平衡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且为世界所公认。所谓“史无前例”，意指中国是获得这种地位的唯一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努力在国内、外建设和宣传的结果，但人们理所当然地还会提出：中国对全球发展趋势的影响是否与其能力相符？中国取得的这种地位难道不是部分地由下面这些国家施加给它的吗？因为这些国家由于自己的力量日益衰落，但为了在国际力量的结构中建立起一种可靠的抗衡力——尽管这种抗衡力是有限的——促使它们去确立中国的地位。要回答这个难题决非易事。拥护中国的人趋于夸大中国的力量，而敌视中国的人则有意贬低中国的力量。本研究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探讨。不过，不把精力过分地集中于该问题本身，而是就中国对世界主要国家和主要地区的政策行为提出详尽的分析。

探讨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如果过分依赖对某一特殊方面或某个具体范围的分析是不行的。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中所涉及到的方面是如此之多、如此之错综复杂、相互又如此之紧密联结，以致于偏重于其中任何

一个方面的描绘都无法得出一幅完整的图画。中国的情况尤其是这样。这是因为中国对外政策的言论是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而它的行动策略又是注重于实力的；它在情感上是属于第三世界的，但又是在中心战略平衡中发挥作用的；它正式拒绝接受超级大国地位，但又是处于取得大国地位的过程之中。因此，本研究所作的尝试也就用不着选择任何一种特殊的方法，而是限于直截了当的分析。同时，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认为适宜和有必要，还要结合那些可能是形成中国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时刻，也许都会有某个单独的决定性因素是重要的，而这个因素也许只有随着形势的变化才会让位给另一个决定性因素。

由于本书是从简述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一章开篇的，所以，就有可能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本作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中国思考问题的核心。而这是不正确的。从认识开篇，就是想着重阐明中国人自己在分析中国外交行动之前对国际体系是怎样想的，以及如何干才能使它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格局。

在本研究的准备工作中，我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举行了题目为《世界政治中的中国》专题讨论会，让学生们参加，同他们进行集体讨论，从中受益匪浅。尽管进行分析和阐释的责任是由我单独承担的，但如果没有全班同学们的智慧，要完成本研究是有困难的。

最后，我对日内瓦亚洲中心执行秘书乔健森博士不断提出建议并给予宝贵支持，对威利·伍德拉夫女士帮助整理各部分手稿，对凯瑟林·马蒂小姐打印了全文第一稿以及注释

和文献目录最后一稿，对津纳·格伦德超速完成最后一稿的
打印工作，一并深表感谢！

哈里什·卡普尔

写于日内瓦

DL76/19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对世界的认识：总的看法	 (1)
第二章	中国与苏联	 (22)
第三章	中国与美国	 (73)
第四章	中国与日本	 (122)
第五章	中国与欧洲	 (191)
第六章	中国与第三世界	 (265)
第七章	向大国地位迈进	 (329)

第 一 章

中国对世界的认识：总的看法

过去的遗产

中国在西方国家于十九世纪抵达她的海岸以前，是一个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文明国家。北部是荒凉的草原和寸草不生的沙漠，西部是崇山峻岭和干旱的高原，东部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南部是无法进入的密林。中国正是在这些地理条件的保护之下才得以建立起一个自足的和高度发达的工业前的文明。因此，她厘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孕育的哲学和文化思想以及她的语言文字等，一般都没有受外部的重大影响，而完全是土生土长的。

即使下面这两个重大的例外，对这一总的规律也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譬如，公元一世纪下半叶佛教的传入，这对中国文化总体的影响来说，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从未成为一个佛教的国家，佛教在中国未起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在别国所起的那种主体宗教和哲学传统的作用。佛教即使在初唐鼎盛时期，尽管传播个人救世的理想，但也不得不依靠儒教压倒一切的力量和威望。儒教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世俗教义，并在今生人生中探求一种和谐的、划分贵贱高低的社会等级制度。

第二个例外是来自亚洲大陆内部的多重压力。游牧部落常常联合起来入侵中国并建立落后部落统治的中国王朝。首先是沿着长城（公元386年的拓跋王朝和公元907—1125年的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后来在华北（公元1125—1234年的金王朝），最后是统治全国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公元1206—1368年）和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公元1616—1911年）。但是，这些王朝都被优越的汉族文化和文明同化了。当游牧的拓跋鞑靼人侵占华北时，他们的皇帝禁止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命令他们的全体人民沿用汉族语言和汉族的风俗习惯。契丹族被汉族的文明同化了。一个世纪以后，他们被金人征服，而金人反而又被儒教吸引了过去。蒙古族和后来的满族，他们曾统治着整个中国，但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蒙古族受到同化，而满族甚至变得“比汉族还汉族，完全归化于被他们所征服的文明，同时，又出于极端崇敬把它珍藏在真空玻璃盒中而窒息”^①。

因此，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几乎没有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它也象中国的文明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整个前工业时期，实质上仍然是土生土长的东西。中国人基于自己优越性的信念，把世界看成是四个同心圆。最内部的核心区域是包括中国、西藏和蒙古在内的都会区。第二圈由附近文化相近的国家——朝鲜和越南组成，这两个国家的一部分国土在古代曾为中华帝国统治着。第三圈主要是由日本人组成的。日本人是一个拥有主权的民族，采用大部分汉族的文

① 丹尼斯·布拉德沃思：《中国的镜子》，伦敦企鵝出版公司，1967年，第328页。